创业机会来源研究： 一个创造观和发现观融合的视角

毕先萍 张 琴 胡珊珊*

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各国(地区)创业机会差异的根源。在融合机会研究的创造观和发现观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基于创新的创业机会来源研究框架,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揭示其对创业机会差异的作用机理。运用全球创业观察(GEM)2001-2010年机会型创业等数据实证检验显示,技术创新通过生产并开发新知识,对机会型创业具有创造性破坏效应,其中研发(新知识生产)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专利(新知识开发)的作用显著为正;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的创新通过影响社会规范及创业者技能,对机会型创业也有积极影响。为此,需要针对性地系统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一国(地区)机会型创业水平。

关键词：创业机会来源 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一、引言

大量研究显示,各国(地区)创业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发达国家的机会型创业较多,经济贡献较大;欠发达国家的创业机会总量多,但以机会型创业为主,成长性较差,经济贡献不明显(Reynolds, et al., 2005; Acs 2006)。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体,转型国家拥有较多的创业机会,但腐败等非生产性创业现象也十分突出(Tonoyan, et al., 2010)。同为研发投入较多的发达国家,美国的机会型创业水平也远高于日本、欧洲等国(Carlsson, et al., 2009)。探究创业机会的来源,是制定创业政策、确保各国实现高水平创业发展的基础(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

创业机会的发现观(Kirzner, 1973)和创造观(Venkataraman 2003)对创业机会的来源分别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创造观主要研究创新型创业机会,认为机会是创业者创新打破市场均衡的结果(Schumpeter, 1934),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Eckhardt and Shane 2003)。熊彼特和新熊彼特传统关注微观技术属性、行业技术体制及其差异对创业机会的影响(Shane 2001a; Marsili 2002);制度经济学、制度学派等则考察制度变迁带来的创业机会(Stenholm, et al., 2013),并以此较好解释了转型国家非创业机会较多的特性(Kshetri 2009)。不过,创造观忽视了对套利型创业等其他机会来源的探究。发现观基于机会开发视角探讨了套利型创业机会的来源,指出市场套利型创业机会源于信息不对称下的决策失误,高度警觉的创业者能及时发现与之相关的资源短缺或过剩,并通过低买高卖从中获利(Kirzner, 1997)。全球创业观察(GEM)研究项目将创业所需制度环境分为一般框架条件和创业框架条件(2008年GEM报告又将该条件区分为效率增强因子和创新创业条件),试图通过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创业机会和创业者的匹配(Acs, et al., 2005; Bosma, et al., 2009)。不过,随着对创业机会的充分开发,机会也将趋于消失。因此,发现观由于忽视创新,无法解释经济发展史上创业机会持续出现和演进的基本事实。

* 毕先萍,广西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530004,电子邮箱:bixianping@gxu.edu.cn;张琴、胡珊珊,广西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530004。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创业机会:基于欠发达地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71163005)、广西大学基金项目“广西促进全民创业政策研究”(编号:XBS090772)及广西大学研究生创新课题“基于创新的广西创业研究”(编号:T32674)的资助,特此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上述两派都只论及一部分创业机会,因而整合二者、构建创业机会来源的系统框架成为必然。为此,本文尝试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创新:一是在融合机会创造观和发现观的基础上,以创新为关键因素,提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对创业机会来源的综合影响并提出两个研究假设。二是以 GEM2001-2010 年部分国家(地区)机会型创业数据为对象,实证检验上述两大假设。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机会型创业具有创造性破坏效应,其中体现新知识生产的研发影响为负,而体现新知识开发的专利具有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制度变量中,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对创业机会也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机会型创业对一国(地区)经济绩效的重要性,上述发现表明,针对性地系统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一国(地区)机会型创业水平很有必要。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基于创造观的创业机会来源的研究框架,在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归纳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影响创业机会的两个假设;第三部分运用 2001-2010 年 32 个 GEM 成员国(地区)的机会型创业数据验证上述假设;第四部分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并给出结论及启示。

二、创业机会来源的理论假设

总体上,对创业机会的分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据合法与否,创业可分为合法创业和非法创业。其中,前者是被社会结构体系内的规范、价值观等认为是恰当和合意的(Suchman,1995),主要体现为生产性创业;非法创业包括非生产性创业(如寻租)和破坏性创业(与犯罪、准犯罪相关),这在转型国家表现更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在合法创业中,又包括创新型创业和套利型创业。前者来自创新,以新知识创造为基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交易成本。后者来自于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可细分为市场套利型创业(源于要素及相关产品的非均衡分布)和技术套利型创业(源于对创新的模仿)(Anokhin,et al.,2011)。本文主要探讨第二个层次即合法创业的机会来源。

本文认为,可以基于创造观和发现观的融合,系统揭示各类合法创业机会的来源。具体而言,创业机会不是外生的,是人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创造的,要经历创业机会的产生、发掘和利用等一系列进程(Kirzner,1973)。因此,创新型创业和套利型创业存在密切关联。具体而言,首先,创业者出于自利实施创新,创造出新知识,打破原有市场均衡、破坏市场上的原有机会,并催生出创新型创业机会(Buenstorf,2007)。创新型创业机会和市场失衡进一步便利了警觉的创业者对其进行套利型开发,衍生出更多创业机会。机会信息的扩散驱使更多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分享部分创业利润,直到机会被开发殆尽,利润消失为止,此时市场回归均衡。这迫使创业者开展新一轮的创新和机会创造、开发浪潮,如此周而复始。如果只有机会创造,那么市场将持续产生新的机会,但无法保证其能够被充分开发;相反,如果只有机会发现,那么随着机会被开发殆尽,创业也将无法持续。因此,创新是各类合法创业机会的根本来源,不过,在创业机会演进过程中,具体的创新因素如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机理有显著差异。技术创新主要体现为研发生产出新知识并进行开发,制度创新则通过确定各类经济活动的相对报酬、影响社会规范及创业者等,影响创业机会的生产与开发。

(一) 技术创新

大量研究显示,创业机会最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通过研发生产新知识并将其商业化,创造新产品、新原料、新工艺、新组织方式及新市场等,打破现有市场均衡和创业机会,创造出创新型创业机会,并引致套利型创业机会,具体包括研发和商业化开发两个阶段。

内生增长理论为机会创造提供了微观基础。即,技术机会内生于对新知识的投资,新知识生产有两种途径——基础研发和干中学,前者生产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非缄默性,是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Arrow,1962)。然而,熊彼特学派强调创新对创业存在两种相反的影响:熊彼特模型 1 提出,创新促进新企业进入;而熊彼特模型 2 中,创新会阻碍新企业进入,却有利于现有企业(Nelson and Winter,1982)。针对前者,有文献证实,创新和知识存量正向影响创业,尤其能显著促进高科技、ICT 创业(Audretsch and Max,2007)等;进一步地,科学突破遵循库恩范式而变迁,导致新知识生产和创业机会呈周期性波动(Sanders,2007)。针对后者也有文献佐证,即研发密度越大,表明企业所需资源投入大、沉没成本高,新企业本身就是资源匮乏的,难以负担,因此创新会阻碍创业(Marsili,2002)。

上述矛盾体现了创新对创业的破坏性创造效应。解开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新知识生产不等于经济上可用的知识,研发不会自动转化为创业机会。要确保新知识生产能够转化为创业机会,关键在于对新知识的

开发,而这一开发效率又主要取决于微观层面的知识基和中观层面技术体制的性质(田莉、薛红志,2009)。(1)知识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突破性、被专利保护的广度、专用性和缄默性、累积性等方面,影响着新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创业(Marsili,2002;Shane,2001b)。新技术的经济价值越高、突破性越强,越有可能被开发为创业机会;新技术的专用性(能否被应用于各种行业 and 不同生产工艺中)、缄默性(在企业间转移所需的成本和难度)越差,累积性(企业已经获得的技术资质能提高其在该领域中产生新知识的能力)越强,越不利于创业。(2)技术体制概念描述企业所在技术环境,主要包括技术生命周期、产业独享体制、研发强度和产业集中度等,不同体制对创业的影响完全不同。根据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当技术领域尚未成熟并且市场是细分化的时候,新企业是最适合的技术商业化的组织模式,新技术更有可能构成创业机会;产业的独享体制越强,新企业越可能保护技术不被模仿,越有可能构成创业机会。

据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从新知识生产和开发两个方面决定着创业机会的来源。为此,提出技术创新假设如下:

假设1:(1)新知识生产与创业机会的关系不明确;

假设1:(2)新知识开发效率与创业机会正相关。

(二)制度创新

如前所述,研发及新知识开发是创新型创业机会的技术根源,并决定着衍生的套利型创业水平。然而,在新知识生产、开发及转化为创业机会的一系列环节中,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制度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为:一是通过改变创业的相对报酬水平,影响资源流向创业的规模,决定创业机会的规模和质量;二是通过强化规范和认知制度建设,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技能等,促进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的匹配。

1. 创业机会的基础制度条件

根据Baumol的理论,制度决定着各类经济活动的相对报酬结构,决定着有多少资源用于创新及创业活动(Baumol,1990)。这一影响被称为过滤器(filter)。以技术创新为例,它通过创新新知识对创业机会具有关键影响,但其具有较大的风险。与此相关的制度通过改变创业风险和报酬决定着有多少新知识能转化为创业机会,因而被称为知识过滤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机构过滤器,如影响研发及商业化的组织障碍等,它影响着大学能产出多少有潜在价值的发明;二是经济价值过滤器,即影响将发明转化为知识产权(以专利形式)可能性的相关政策;三是商业价值过滤器,反映将知识产权通过许可或新企业创业而商业化的可能性(Carlsson et al.,2009)。

大量文献探讨了创业发展所需的基础制度条件(Bjørnskov and Foss,2008;Nyström,2008),概括而言包括下列三方面:(1)法律制度。稳定及界定清晰的法律架构能保护创业租金免于被任意征用,节约与创业相关的交易费用,减少风险,鼓励创新创业活动。尤其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成果产业化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激励研发者生产出更多新知识,提升知识转化为创业机会的可能性。(2)自由市场制度。自由开放的市场制度能充分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避免腐败和寻租现象,促进生产性创业发展。(3)有限政府干预。适度有限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生产性创业的发展。如果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垄断关键资源和行业、设置行业进入壁垒、制定复杂的官僚程序等,会增加创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通过制度创新、降低过滤器的厚度,能引导更多资源流向生产性创业,是一国(地区)创业及财富创造的关键。

2. 创业机会开发的制度创新

研究显示,机会创造不等同于机会开发。创业者与非创业者显著不同,具有较强的警觉性、风险感知、自信、先验知识和社会网络等(林嵩等,2005)。因此,相关制度创新主要是强化规范和认知制度建设,提升创业者创业意识和技能,提升机会开发效率。(1)规范制度指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等,它反映一国(地区)居民对创业家和创业活动的赞赏程度。原则上,创业内生具有超前性、创新性和不确定性,它通常会超越现有公众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进而存在“合法性”问题。因此,社会对创业的赞赏会促使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业。(2)认知制度反映一国(地区)中人们拥有的知识、技能及信息分类评价框架,相关制度创新能够提升创业者技能,促进对创业机会的开发(Spencer and Gómez,2004)。

据此,本文提出创业机会来源的制度创新假设:

假设2:(1)基础制度创新与创业机会正相关;

假设2:(2)基于机会开发的制度创新与创业机会正相关。

三、实证检验

(一) 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1. 计量模型与变量

为检验创业机会来源的两个假设,本文设定下列模型,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两大因素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检验其对创业机会的影响。

$$OE_{it} = \alpha_0 + \alpha_1 TEC_{it} + \alpha_2 INST_{it} + \alpha_3 Z_{it} + U_{it}$$

因变量: 本文采用 GEM 报告中的机会型创业活动指数(opportunity - driven entrepreneurship 简称 OE) 来代表合法创业机会。GEM 用 TEA(早期创业活动指数, 是 18 ~ 64 岁人口中初生创业者或新企业的拥有所有者的管理者的比例) 来衡量创业活动, 并将之区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是指一些人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而被迫进行的创业活动, 而机会型创业是指一些人已经感知并追求商业机会而从事的创业活动(Reynolds et al. 2005) 能较充分地体现创业机会规模。由于历年 GEM 参与国家和地区都有变动, 本文筛选了 2001 - 2010 年数据相对完整的 32 个国家和地区^①为研究对象。

自变量分为三类: (1) 技术创新变量 TEC_{it} , 包括研发(代表新知识的生产) 和专利(代表新知识的开发); (2) $INST_{it}$ 为制度变量, 其中基础制度变量用 Fraser 的经济自由度指标表示, 与机会开发相关的制度变量用规范制度、认知制度(来自于 GEM) 来表示。(3) Z_{it} 为国别(地区) 变量, 为控制国别(地区) 差异, 选取经济增长率($GDPGR$)、开放度($OPEN$)、城市化率($URBAN$) , 考虑到经济增长与创业机会互相影响, 将其滞后期一期。另加入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GDP) (取对数) 以控制规模效应, 同时控制年度效应。 U_{it} 为随机扰动项, 包含未被解释到的因素以及模型估计误差。

2. 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模型分析所涉及到的具体变量名称、数据来源及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	数据来源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个数
OE	每百人中进行机会型创业活动的人数, 为 TEA 指数减去生存型创业指数	GEM 2001 - 2010	5.594	2.748	16.368	0.900	270
EFW	经济自由度(0~10), 包括政府规模、法律结构和产权保障、有效货币可得性、国际贸易自由度、信用、劳动力与商业规制	FRASER 2001 - 2010	7.474	1.023	9.050	5.140	320
$NORM$	规范制度, 每百人中认为成功的创业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数	GEM 2001 - 2010	67.201	7.540	90.000	31.000	217
REC	认知制度, 每百人中认为自己具备创业所需知识技能的人数	GEM 2001 - 2010	42.599	0.762	81.000	9.000	272
RD	科技变量一: 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	WDI 2001 - 2010	0.018	0.048	0.003	0.010	279
PAT	科技变量二: 人均专利申请量(包括居民与非居民专利申请数据), 表示新知识的生产与开发	WB 2001 - 2010	0.001	0.003	0.000	0.001	310
$GDPGR$	经济增长率, 以 2000 年为基年	WB 2001 - 2010	0.027	0.148	-0.180	0.039	320
$OPEN$	开放度, 进出口额占 GDP 比重	WDI 2001 - 2010	0.955	0.835	4.605	0.203	320
$URBAN$	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比重	WB 2001 - 2010	0.779	0.140	1.000	0.372	320
$LGDP$	国内生产总值(按 2000 年不变价美元计), 取对数	WB 2001 - 2010	26.316	1.619	30.087	22.859	320

注: OE 、 $NORM$ 、 REC 指标来自 GEM 数据库(<http://www.gemconsortium.org/key-indicators>); EFW 指标来自 FRASER 数据库(http://www.freetheworld.com/datasets_efw.html); RD 、 $OPEN$ 指标来自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PAT 、 $URBAN$ 、 GDP 指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①样本国家和地区包括: 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克罗地亚、丹麦、芬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希腊、中国香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荷兰、新西兰、挪威、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

(二) 模型设定和检验

模型设定采取测试法: 首先 模型 1-3 单独考虑每个制度变量对创业机会的影响 模型 4 估计所有制度变量对创业机会的影响。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基础上 模型 5 和 6 分别加入研发和专利变量检验其对创业机会的影响。模型 7 综合考虑所有变量进行检验。汇总结果见表 2。

表 2 OLS 回归分析结果

OE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i>EFW</i>	0.953 ^{***} (3.461)			0.458 [*] (1.819)	0.778 ^{***} (2.858)	-0.161 (-0.592)	0.248 (0.942)
<i>REC</i>		0.135 ^{***} (12.163)		0.127 ^{***} (9.826)	0.114 ^{***} (7.737)	0.147 ^{***} (11.246)	0.125 ^{***} (9.083)
<i>NORM</i>			0.068 ^{***} (4.044)	0.018 (1.207)	0.029 ^{**} (1.974)	0.034 ^{**} (2.336)	0.051 ^{***} (3.706)
<i>RD</i>					-49.006 ^{***} (-2.753)		-75.520 ^{***} (-4.462)
<i>PAT</i>						1180.772 ^{***} (4.960)	1404.239 ^{***} (6.011)
<i>GDPGRLAG</i>	26.747 ^{***} (4.682)	20.797 ^{***} (4.642)	19.787 ^{***} (3.451)	21.585 ^{***} (4.428)	16.491 ^{***} (3.128)	19.213 ^{***} (4.030)	13.185 ^{***} (2.687)
<i>OPEN</i>	-1.722 ^{***} (-6.443)	-0.449 ^{**} (-2.131)	-1.251 ^{***} (-4.744)	-0.679 ^{***} (-2.703)	-0.769 ^{***} (-2.944)	-0.494 ^{**} (-2.031)	-0.756 ^{***} (-3.155)
<i>URBAN</i>	4.682 ^{***} (3.643)	5.091 ^{***} (5.222)	6.224 ^{***} (4.840)	4.546 ^{***} (4.043)	5.047 ^{***} (4.131)	3.472 ^{***} (3.065)	4.085 ^{***} (3.616)
<i>LGGDP</i>	-0.468 ^{***} (-4.518)	-0.089 (-1.024)	-0.370 ^{***} (-3.404)	-0.128 (-1.355)	-0.056 (0.569)	-0.192 ^{**} (-2.075)	-0.113 (-1.227)
Constant	8.091 ^{***} (2.658)	-1.881 (-0.746)	6.622 ^{**} (2.039)	-4.449 (-1.504)	-8.418 ^{***} (-2.732)	-0.022 (-0.007)	-4.387 (-1.507)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 R^2	0.191	0.478	0.213	0.473	0.463	0.523	0.555
F-test	5.503	18.484	5.874	14.873	11.864	16.245	15.246
<i>N</i>	249	249	217	217	190	219	184

注: 系数下方括号内为采用修正了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的标准误计算的 t -统计量; ***、** 和 * 分别表示双尾 t -检验统计量在 1%、5% 和 10% 的水平统计显著。

(三) 结果分析

模型 1-3 显示 每个制度变量对创业机会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模型 4 综合考虑全部制度变量的影响 显示经济自由度 *EFW* 和认知制度 *REC* 显著。模型 5 显示 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基础上 研发 *RD* 对创业机会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而模型 6 在控制制度变量效应基础上 显示专利 *PAT* 对创业机会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考虑全部变量的模型 7 与前面各模型基本一致 表明本实证研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此 本文以模型 7 为主进行分析。

(1) 针对研究假设 1 模型 7 显示 技术创新的两个变量对创业机会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 假设 1(1) 未获支持 研发的影响为负(系数为 -75.520) 表明研发对创业机会具有抑制作用。假设 1(2) 获得支持 专利的影响显著为正 系数高达 1404.239。二者的 t 值都较大 显示检验结果比较好。总体上 上述结果证实技术创新对创业具有创造性破坏效应 其中新知识的开发(专利)对机会型创业的发展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为此 要促进机会型创业的发展 应将重点放在提升新知识开发效率上。这点与 Carlsson 等(2009)的观点一致 即日本、欧洲等国虽然在研发投入上不逊于美国 但其知识开发效率较低 导致创业发展水平远低于美国。

(2) 假设 2 获得支持: 其中认知制度 *REC* 和规范制度 *NORM* 对创业机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经济自由度 *EFW* 在模型 1、4、5 中都显著为正 但在模型 6 和 7 中不显著(见表 2)。结合对假设 1(2) 的验证(即新知识的开发对机会型创业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可知 要提升对创业机会的开发效率 急需通过深化制度创新 着重提升社会对创业者地位的认知、以及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技能水平。

(3) 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率的滞后项 $GDPGRLAG$ 、城市化率 $URBAN$ 对 OE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一国(地区)除了致力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还应提升总体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对外开放 $OPEN$ 对 OE 具有抑制作用,其作用机理较为复杂。从国际贸易角度看,繁荣的国际贸易意味着一国(地区)感知国际价格信号的能力较强,便于潜在创业者更好地利用各种创业机会,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国外创业者的竞争(林嵩等 2005)。另外,开放度的提高便利一国(地区)尤其是技术落后国家(地区)以较低成本吸收并开发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技术,为创业者发现机会提供更深远的动力;但知识溢出理论指出,这有可能损害作为溢出方的发达国家(地区)的研发动力,削弱其创新创业动力,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创业机会的创造和开发(赵勇、白永秀 2009)。因此,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细分国别(地区)类型研究。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创新体现在,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在融合创造观和发现观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创新的机会来源分析框架,并据此提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影响创业机会的两个理论假设。数据检验证实了这两个假设,得出下列结论:技术创新对创业具有创造性破坏效应,研发的影响显著为负,专利的影响显著为正;制度创新中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对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本文开篇所述各国(地区)创业机会发展差异的原因。

基于机会型创业对一国(地区)经济绩效的重要性(Acs 2006),由上述结论可得出如下启示,有必要提升机会型创业发展水平,而这又需要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同时着手。首先,需要制定有利于创业机会开发的技术创新战略,尤其应将重点放在提升新知识开发效率方面。其次,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完善自由市场制度以降低创业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应重点优化制度环境,提升社会创业规范水平和创业者的创业技能,提升知识开发效率,促进创业机会与创业者的良好匹配。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对创业机会的度量采用 GEM 的机会型创业指标,受数据限制,导致可用的样本国(地区)数量有限。为此,拟在后续研究中优化创业机会的度量指标和测量方法。

参考文献:

1. 林嵩、姜彦福、张炜 2005 《创业机会识别:概念、过程、影响因素和分析架构》,《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 6 期: 128 - 132.
2. 田莉、薛红志 2009 《新技术企业创业机会来源:基于技术属性与产业技术环境匹配的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 3 期: 61 - 68.
3. 赵勇、白永秀 2009 《知识溢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第 1 期: 144 - 156.
4. Acs Zoltan. 2006. "How is Entrepreneurship Good for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ons* ,1(1) : 97 - 107.
5. Acs Z. J. ,P. Arenius ,M. Hay ,and M. Minniti. 2005.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4: Executive Report*. Babson Park ,MA: Babson College; London ,UK: London Business School.
6. Anokhin ,S. ,J. Wincent ,and E. Autio. 2011. "Operationalizing Opportuniti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Use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7(1) : 39 - 57.
7. Arrow K.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0(1) : 155 - 173.
8. Audretsch ,D. B. and Max Keilbach. 2007.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 44(7) : 1242 - 1254.
9. Baumol ,W.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 893 - 921.
10. Bjørnskov C. ,and N. Foss. 2008. "Economic Freedom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ome Cross - Country Evidence." *Public Choice* ,134(3) : 307 - 328.
11. Bosma N. ,Z. J. Acs ,E. Autio ,A. Coduras et al. 2009.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8: Executive Report*. Babson Park ,MA: Babson College; London ,UK: London Business School.
12. Buenstorf ,G. 2007. "Creation and Pursuit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erspectiv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8(4) : 323 - 337.
13. Carlsson ,B. ,Z. J. Acs ,D. B. Audretsch ,and P. Braunerhjelm. 2009. "Knowledg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A Historical Review." *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18(6) : 1193 - 1229.
14. Eckhardt J. T. and S. A. Shane. 2003.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 29(2) : 333 - 349.
15. Kirzner J.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Kirzner J. M. 1997.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1) : 60 – 85.

17. Kshetri ,N. 2009.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 – Socialist Economies: A Typ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for Market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7(3) : 236 – 259.
18. Marsili ,O. 2002. “Technological Regimes and Sources of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3) : 217 – 231.
19. Nelson ,R. R. ,and S.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 Nyström ,K. 2008. “The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Public Choice* , 136(3 – 4) : 269 – 282.
21. Reynolds ,P. N. ,N. Bosma ,E. Autio ,S. Hunt ,et al. 2005.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 Colle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998 – 2003.”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 : 205 – 231.
22. Reynolds ,P. 2005. “Understanding Business Creation: Serendipity and Scope in Two Decades of Business Creation Studi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4) : 359 – 364.
23. Sanders ,M. 2007. “Scientific Paradigm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Cycles in Economic Growt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8(4) : 339 – 354.
24. Schumpeter J.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5. Shane ,S. ,and S. Venkataraman.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 25(1) : 217 – 226.
26. Shane ,S. 2001a. “Technology Regimes and New Firm Form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47(9) : 1173 – 1190.
27. Shane ,S. 2001b.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New Firm Cre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47(2) : 205 – 220.
28. Spencer ,J. W. ,and C. Gómez. 2004.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Economic Factors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Multicountry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7(10) : 1098 – 1107.
29. Stenholm ,P. ,Z. Acs ,and P. Wuebker. 2013. “Exploring Country – 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the Rate and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1) : 176 – 193.
30. Suchman ,M. 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 571 – 610.
31. Tonoyan ,V. ,R. Strohmeyer ,M. Habib ,and M. Perlitz. 2010. “Corrup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ow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Shape Small Firm Behavior in Transition and Mature Market Economi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34(5) : 803 – 831.
32. Venkataraman ,S. 2003. “Foreword.” In *A General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Individual – opportunity Nexus* ,ed. S. Shance , Xi – xii.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The Origin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An Integration of Creation Theory and Discovery Theory

Bi Xianping ,Zhan Qin and Hu Shanshan
(Busines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igi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By integrating creation theory and discovery theory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novation – bas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the diversit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sing GEM data from 2001 to 2010 ,our empirical test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a creative destruction effect on opportunity – driven entrepreneurship ,among which the impact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nd that of pate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cluding cognitive institution and normative institution also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opportunity – driven entrepreneurship by affecting social norms and entrepreneur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rgete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ould be advanced systematically so a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opportunity – driven entrepreneurship in a country.

Key Words: Origin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Techn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M13

(责任编辑: 彭爽)